

沈耀勛

著

回憶人生路

——粵桂邊區革命鬥爭回憶錄

廣西民族出版社

回憶人生路

沈耀勳

(桂)新登记字 02 号

回忆人生路

沈耀勋著

☆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南宁市社会福利厂印刷

※

开本 850 1168 1/32 5.875 印张 插页 6 130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5363—1795—6/Z · 136 定价：4.80 元

序 言

我同沈耀勋同志有过三段相处时间。1945年冬，我率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一团西进十万大山，沈耀勋同志是防城县游击大队的领导干部之一，协助我团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追剿，也一同撤入越南高平省休整，编为我团第四营，并肩战斗一年多。那时他20岁左右，年青有为，工作积极。1950年冬，我任钦州军分区副司令员，耀勋同志是广西军区独立第三团政治处主任，该团归军分区领导，经常开会见面，共同工作有一年多。那时建国伊始，我军要向现代化、正规化迈进，形势要求部队干部要有较高文化水平，耀勋同志是高中毕业生，勤奋好学，接受新鲜事物快，当时是很难得的。1984年我离休回广州定居，住在广东省军区沙河干休所，1988年耀勋同志作为副军职干部也离休回广州解放军体育学院干休所定居，同我相距不远，经常见面，相处甚欢。他告诉我要写回忆录，给后人留下革命真迹，我祝愿他成功，不久他患了肝癌，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写作，当写完此书稿的时候，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他过早地离开了人间，他的回忆录也就成为遗作了。

我怀着对战友的无限思念，阅读了沈耀勋同志的遗著《回忆人生路》（下简称《人生路》），作为此书的第一批读者，我个人得到很大启发和感受。

人生在世几十年，占据着一段历史时间，从《人生路》里面，

从一个侧面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沈耀勋同志生于1925年，终于1993年，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崩溃、新中国成立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遇到挫折又继续前进的伟大时代，他继承了前人开创的革命事业，在抗日战争的特定环境里，开始参加变革社会的实践，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抗战后期，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起义，拿起武器打击日本侵略者。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他继续拿起武器，进行4年敌后游击战争，终于在1949年同南下大军胜利会师，解放了粤桂边区，迎来新中国的诞生。解放后，耀勋同志长期在军事院校担任教学和领导工作，为我军现代化建设培养干部，院校的工作似乎是平静的，建设似乎比革命容易。其实不然，我们对现代化建军没有经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推行极左路线，对我军工作干扰很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登峰造极。像耀勋同志这样的好同志，竟蒙受不白之冤，铁窗五载，严刑拷打。这场历史灾难，说明我们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某段时期偏离了马列主义轨道，发生严重失误，国家付出了代价，个人承受了牺牲。《人生路》悟出一条道理，破坏一个旧世界要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建设一个新世界也是艰难曲折，要付出代价的。

个人是集体的组成者，《人生路》叙述个人的斗争经历，看到十万山地区党和人民群众的奋斗。十万山区是中共华南分局、粤桂边区党委十分重视的游击根据地，起着配合正面战场的作用，十万山区游击队是一支坚强的敌后武装，这支武装诞生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发展壮大在解放战争的暴风雨年代，沈耀勋同志参加这支部队的创建和活动，担任主力营、团的政委，打过许多胜仗，因此，他个人的经历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十万山区武装斗争的历史，反映了一个群体的奋斗业绩，为地方党史、军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我特别要指出：耀勋同志曾三次同部队到越南，或是抗日、抗法，或是休整，或是执行联络任务，当时是秘密行动，

少有文字记载，我们的当事人撰写回忆录，有助于把这些秘史重现。耀勋同志的写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他力图使自己的回忆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为此翻阅大量历史资料，访问不少知情人，互相印证补充，去伪存真，他叙述历史不夸张，不虚饰，实事求是；他对人对事不溢美，不护短，比较客观公正。当然，年代久远，记忆模糊，有些事实可能错漏，但从整体上说是真实可信的。

《人生路》还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知识分子成长的道路，耀勋同志是贫苦的知识分子，在日寇入侵、家庭破败的情况下走上革命道路，与工农相结合，在参加变革客观世界的同时，注意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成为一名比较成熟的革命者。在革命战争年代，他艰苦奋斗，英勇杀敌，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在我军现代化建设中，他兢兢业业，为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培养人才而沥心沥血。更可贵的是，他经得起来自革命队伍的不公正的处置。1946年在越南七溪整训时，他与何英（沈月英）同志的恋爱婚姻关系是正常的，但部队有些领导同志却作出不公正的处置，耀勋同志虽受了委屈，但愉快回国参加解放战争，情绪高涨，表现了坚强的党性。在文化革命中，他被诬陷为“特务”、“反革命”，受到非法绑架，严刑拷打，过了5年铁窗生活。他的共产主义信念没有动摇，他的精神支柱没有崩溃，坚持实事求是，宁死不讲假话，正气凛然。事实证明，沈耀勋同志是经得起烈火检验的真金，是平凡而又伟大的共产党人。

沈耀勋同志参加革命后一帆风顺，勇往直前，文化大革命中祸起萧墙，身陷囹圄。如此大起大落，离奇曲折，他能把自己的经历，放在中国革命、群众斗争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叙述，站在历史的高度进行总结，这对我们及后人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如果写得充实一点、更具体一点、情节更生动一点，多穿插些斗争故事和乡土人情，那么可能更生动感人。但是，沈耀勋同志是同病魔搏斗中抢时间的，能写完稿子就是胜利，白璧微瑕，不要企求

太高了。

原粤桂边纵队副司令员

唐才猷

1993年7月26日

目 录

一、我的家乡.....	1
二、广州寻父.....	4
三、国破家难.....	7
四、追求进步	11
五、励志苦读	15
六、防中风雨	19
七、驱沈学潮	23
八、回乡革命	27
九、营救同志	32
十、那良起义	37
十一、挺进塘花	41
十二、痛击日寇	45
十三、回国休整	48
十四、入越联系	53
十五、新街惊变	58
十六、野火春风	64
十七、反抗围剿	68
十八、撤入越南	72
十九、故地惊雷	79
二十、奉命回国	83
二十一、生死搏斗	88
二十二、白皮红心	94

二十三、板蒙策反	99
二十四、奇袭芒街	103
二十五、反攻凯歌	110
二十六、并肩战斗	115
二十七、会师小董	123
二十八、东进高雷	128
二十九、肃清残匪	132
三十、献身国防	137
三十一、祸起肃墙	144
三十二、滥施酷刑	148
三十三、冤狱五载	153
三十四、株连亲友	162
三十五、送别父亲	169
三十六、历史重光	174
后记	180
写在出版之前	182

一、我的家乡

公元 1925 年 3 月 20 日（民国 14 年农历 2 月 26 日），我出生在广东省防城县那良镇南面 6 公里修尧村的一户沈姓农民家庭，对河便是越南海宁省。解放后防城县两次划归广西壮族自治区，因此我的前半生是广东人，后半生是广西人。

我们沈家是客家人，祖先从广东嘉应州（梅县）迁来，今梅州市有沈氏祠堂，那良镇亦有沈氏祠堂，那良沈家祠的门联写道：“籍移嘉应，聚居在是，”清楚记载了家族的来源。据考证，沈氏家族迁来那良已有 10 代以上了，大约是在 18 世纪中叶，即清朝乾隆初年。迁移原因不清楚，大概是因为粤东山多田少，人口增加，谋生困难；或者天灾人祸，被迫远走他乡。相传我们祖先是聚族迁移的，扶老背幼，牵牛挑担，一步步从东向西移动，寻觅可耕之地，一直走到十万大山脚下，那时那良一带叫古森峒，是少数民族地区，广东、广西、越南三不管地，荒地较多，人烟稀少，客家移民（包括其他姓氏）就在这里停下来，披荆斩棘，辛勤开垦祖国的边疆。我的太高祖沈庆云落籍在那良饭河村，历 5 代，繁衍了几百子孙，田地不够耕种，大约在 1920 年左右，我祖父沈启祥从饭河迁到上游 4 公里的修尧村起屋居住。祖父有 4 个儿子，大伯沈兴、二伯沈昂（字星一）和祖父是清末秀才，三伯沈柱没有文化，是种田人。我父亲沈鑫、字荇余，教过私塾，兼行医。母亲苏积康是农村妇女，不识字，但能说会道，口齿伶俐，慈祥和蔼。我们家四代同堂，同堂兄弟 13 个，姐妹 6 个，加上婶嫂，男女 30 多人，熙熙攘攘，热闹得很。我是勋字辈，取名耀勋，排第九，乳名亚寿。参加革命曾用名苏勋。

我们家具有客家人的一般特性。一是勤劳，天未亮全家大小

一齐起床，做一、二小时工，才吃早餐，叫“食朝”；中午喝些稀粥叫“食晏昼”；稍事休息，就一直干到天黑才收工吃晚饭，叫“食夜”。一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女同耕的中国农村生活。修尧村这座二进七间的大屋，是我大伯、三伯为主建起来的，因劳累过度，他们刚住上新房，年纪轻轻便谢世了。我几岁就跟大人劳动，放牛，农忙季节帮助抢收抢种，轮到我母亲做“伙头”（每个媳妇轮流给全家做一天菜饭），我即帮助挑水打柴，所以我从小养成了劳动习惯。二是节俭，修尧村田地饶薄，耕作落后，产量很低，要做到够吃和有剩余，只有勤俭持家。我们几十人的大家庭，一餐放几斤米，先捞几碗干饭敬奉老人，全家则以稀饭、杂粮充饥，最后剩下米汤用来喂猪，所以客家人养的猪肉层肥厚，原因就在这里。我们除年节买些肉食外，食物基本上是自给自足，我这个人能吃苦，不择食，是小时养成的。三是团结，客家人很注意保持自己族性，祖宗的语言不能改，传统的习俗代代相传，外出遇到“讲艾”（客家话）人便有一种认同亲热感，有困难就大家帮，受欺负则拔刀相助。我记得祖训有两句话：“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这种团结互助性是在长期同大自然和社会斗争中形成的，在我们边境山区，兵灾匪患频繁，村落小而分散，没有高度团结互助，是很难立足生存下来的。

我们家族世代务农，读书做官的人不多，到了祖父有文化，卖文积钱，买了几十亩田地，才重视送子弟读书，我的7个堂兄和1个堂姐，都到那良圩读过小学堂，有的还到外地上了中学。我们几个未成年的兄弟姐妹就在家读三字经、成语考，背诵古诗词，那时不解其意，就是会读会写一些字而已，我的童年缺少现代科学文化的滋润，知识少，思想受到局限。

我家门前是一片100多亩的稻田，穿过田间两、三百公尺，便是北仑河。北仑河是条美丽的小河，很有名，它是中国和越南的界河，地理教科书说，我国海岸线，北起鸭绿江口，南至北仑河

口止。北仑河发源于十万大山南麓，自西而东穿流于丛山峡谷中，沿岸多原始森林，有些地方滩多流急，有些地方平静如镜，水清见底，鱼游可数，繁殖在清澈水中的鱼虾特别鲜美，有一种鱼叫“山娟”，非常好吃。我从小就爱上北仑河，夏天在江中放牛泡水，追逐嬉戏；冬天在水源林里装竹盖，拉绳子，捕鱼鸟捉鼠；我还跟哥哥们撑排江上，撒网放钓，装鱼笼虾笼，每天都捉得一些鱼虾做菜。我们还利用河滩急流来安装水车，引水灌田，北仑河给我们的好处实在太多了。

北仑河南岸越南境内两、三公里处，一座壁立山峰拔地而起，高度 600 多公尺，叫马头山。有人说它形状象马得名；有人说十万山脉西端叫马头山，东端叫马后口，互相对应而得名。我倒是倾向于前一种说法，越看它越象一匹奋蹄的雄马，山的东端是六虎山，好象飘起长长的尾巴，西端连接乌山，形成一条 10 多公里的山脉，与北仑河平行，宛如一堵蓝色高墙，山上原始森林遮天蔽日，郁郁苍苍。山的南边是丘陵平原，田畴肥沃，一直伸展到海边。越过山脉进入越南纵深地带，只有两个隘口，东段过佛子隘，西段过吊哨隘，形势非常险要。1885 年法国占领越南后，中越人民的抗法斗争风起云涌，有个义军首领叫刘奇，防城扶隆人，自称“小刘义”（刘义是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率领数千抗法武装，以马头山为根据地，突入越南腹地，捕捉了法国银行家李约德，1892 年刘奇到六南作战，和法军上校法诺同归于尽（见越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61 页），他的部下坚持斗争到 19 世纪末年。1908 年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黄兴又以马头山为集结掩蔽地，进兵钦防，史称“钦廉，上思之役”。这说明了马头山军事地位的重要，又反映了我的家乡有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传统。

孩提时代的农村生活充满着诗情画意，但印象有些模糊，回忆很简单，这 10 年是我来到人间的第一级阶梯，生命的幼苗就是植根在这块特定的土地上。

二、广州寻父

20 世纪 30 年代，防城出了一个大官，就是鼎鼎大名的“南天皇”陈济棠，他是粤军总司令，执掌着广东军政大权。在他统治广东期间，社会比较安定，经济有所发展，创办了一批工交企业，修筑了广东的公路干线，广州市的重大建筑——海珠桥、中山纪念堂、长堤等都是这时候建筑起来的。陈济棠的老家，在防城县的望兴村，距那良很近，同是客家人，与那良的大姓都有一些亲戚关系。他为了加强其统治地位，提携了一批乡亲去帮他办事。那良的巫剑雄、杨鼎中、叶寿尧当了粤军师长，覃伯棠、郑日东帮他理财收税。因此那良很多人，只要有一点文化，有一点能力的，都通过各种关系到广州谋职。我父亲有些文化，因经商失败，变卖祖父的田产还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也来广州投亲靠友谋生，找到了亲戚陈群甫，便在禁烟局里做一名会计，兼行中医，收入较优，能养活家庭。1935 年春，他写信告知母亲，带儿女来广州居住。我母亲虽是农村妇女，但颇泼辣精灵，她便拿着父亲来信的地址，带着我和姐姐沈志勋、弟弟沈鼎勋、沈国勋，离开修尧。那时防城还没通汽车，所以坐拉滩小木船下东兴，又从东兴乘坐小轮船到北海，改乘英商大古航务公司的轮船到香港。在轮船上，我第一次看见大海，一望无际，天水相连，感到世界很大。开航时，船还比较平稳，我和弟弟跑去跑来玩耍，母亲生怕我们出意外，拉着我们回舱坐定。轮船驶过琼州海峡，母亲有点晕船，但还坚持去买饭菜，我们感到船上的饭菜好新鲜，吃得很起劲。我和弟弟又去扭自来水开关，正玩得高兴，一个红须绿眼的番鬼佬（外国人）气冲冲地跑过来，口里吱哩咕噜，吓得我们拨腿跑回船

舱躲藏起来。船过七洲洋，无风三尺浪。我们开始晕船呕吐，吃的饭菜全部吐光了，最后连黄水也吐出来，非常难受。母亲比我们吐得更厉害，已经不能动弹了。过了七洲洋，船行平稳了，晕船才逐渐减轻。经过3天的航行，在一个夜晚到达了香港。香港的夜景十分迷人，远看好象一座灯山，五光十色，车来人往。上了香港码头，母亲怕我们走失，一个拉着一个的手，东张西望，幸好一眼就看见了前来迎接我们的父亲。我不禁大喊“爸爸”，全家高兴得很！我们在香港停留几天，就乘车来到了目的地广州。

到了广州，我们住进父亲已预先租好的天马巷一幢房子的二楼。对面居住着那良同乡严端良夫妇。我们叫她（他）们为表姐、表姐夫，常来常往。父亲带我们去游中山公园，上大新公司（今新大新公司）购买物品。离开修尧，经过东兴、北海、香港、广州，一个城市比一个繁华，彷彿进入了一个全新世界，一条条宽阔的大街，一幢幢高耸的大厦，人如流水车如龙，灯光通明，熙熙攘攘，我感到人类的创造力实在太伟大了。住定以后，父亲即安排我们上学，我和姐姐入广州市第八十五小学，这时我十岁读三年级。姐姐比我长三岁，亦和我同班。弟弟鼎勋入番山小学读一年级。小弟国勋在家由母亲看管。我和姐姐在第八十五小学读了一年多，父亲为了培养我们的独立生活能力，又转学到广东中学附小寄宿就读，星期日才回家。在学校期间，几十个学生同在一教室，坐得整整齐齐，课本不是“人之初，性本善，”而是语文、算术、史地、自然等现代科学知识。我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些新知识，开始理解“爱群大厦”盖得这么高，“海珠桥”筑得这么长，其神奇力量就是现代科学技术。我也开始懂得了世界和国家的大事，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进逼华北，蒋介石不抵抗，中国人民就起来抗日救亡。

在我印象中有两件最深刻的事情：一件是1935年，学校停课，万人空巷，出来欢迎胡汉民回粤，游行几天几夜。为什么要搞这

样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现在才知道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两广的地方实力派就把这位国民党元老抬出来，和蒋介石对抗。第二件是，1936年广州举行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标语贴满大街小巷，学生上街游行，组织纠察队到商店、轮船上去检查日货。我也参加了这个人山人海的示威行动。为什么情绪这样激烈，当局没有制止？现在我才知道是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等发动“六、一”运动，打出抗日的旗号，来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

“六、一”大示威以后，两广当权者和南京蒋介石政府兵戎相见，蒋介石收买了粤军军长余汉谋反戈，收买了广东空军北飞，陈济棠被迫宣布下野出走。陈济棠下台，对钦防来广州谋职的人，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发了财的人都纷纷移居香港或回乡置屋买田，我父亲是个下层职员，地位不高，不是官亲富室，仍在广州任职下去，生活上没有很大威胁。所以我家继续在广州住到抗日战争爆发。

无独有偶。到了1988年1月，组织上批准我离职回广州定居，次年志勋姐姐从防城来广州探望。姐弟相逢，畅谈当年在广州居住的生活，都十分留恋。我们提议去寻觅故居，我带着爱人、小孙，走过许多大街小巷，终于在高第街附近，找到了天马巷，但是旧貌变新颜，换了一座座新房，原来我们住的那间屋找不见了。我们又行过几条街，寻找距离不远的第八十五小学，也不见，大概已经拆迁。当年我们都是学童，如今变成老人，一晃就半个世纪，沧海桑田，社会进步了，老的东西逐步抛弃，我们只能站在天马巷的街牌下面，徘徊留连，拍照留念，以寄托我们对故居的追思。

三、国破家难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我们在广州过了两年多的和平生活，开始受到了战争的冲击，反对日本侵略、保卫国家独立，民族生存的斗争，席卷整个广州，爱国的师生组织群众大游行，上街演戏、演讲，唱歌，日以继夜地进行，群众献金支援前线，欢送军队北上抗日，轰轰烈烈，十分感人。我正处在知书识理的年华，目睹这种情景，不禁热血沸腾，开始萌发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做亡国奴的爱国思想。

抗战初期，广州虽远离战场，但它是大城市，已受到侵略战争的威胁，日寇飞机狂轰滥炸，残酷杀害老百姓，人们开始疏散，纷纷到市郊农村躲避。我们和父母一家逃到南海县容奇镇瓦窑村居住，我五岁的二弟国勋，突患急性咽喉炎，发高烧，因缺医少药，结束了幼小的生命。全家都为失去了这位天真活泼、聪明伶俐的小弟而悲伤，特别是母亲，痛哭数月，不思饮食，还恢复不了正常的生活，我和弟弟鼎勋在玩耍时，常感到少了一个可爱的好玩的小弟而伤心。

战争很快从华北打到华中，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广州是取得海外补给的重要通道，面临着敌人进攻的危险，居民纷纷逃离，重要机关撤走，市面萧条，我父亲濒临失业。1938年2月，我们随父母逃离广州，沿着向老家的方向逃难，千辛万苦，先回到了吴川县的梅篆镇，父亲在中药店找到了一份工作，暂住了半年多，我就在梅篆小学读六年级。这时，日本侵略军沿长江而上，进攻我临时抗战中心武汉，广州成为保卫大武汉重要的一翼，日本为切断武汉抗战的生命线，1938年10月，日军在南海大亚湾登陆，

21日占领广州，武汉便于10月27日沦陷。

战火燃烧到华南，梅篆离广州不远，不能再住下去了，于是继续向老家方向逃难。1938年10月间，我们到合浦县城廉州镇，父亲在税务所任职员，我同姐姐志勋在海门中学读书，我读初中一年级，开始了中学的读书生活。在抗日战争环境下的读书生活是很不正常的，我们的大部分精力放在抗日救亡运动上。合浦县的抗日救亡运动，留给我难忘的记忆。廉州镇到处张贴着抗日救国的标语口号、宣传漫画，一队队学生在街头宣传演讲，领唱抗日救亡歌曲，还有工人、学生、商人、百姓集合上街游行，高呼抗日救亡口号。有一次我观察宣传队街头演说，有个人突然从前面跑过，有人叫“捉汉奸呀！”人群骚动起来，这个“汉奸”左冲右突，群众这头拦，那边堵，把他促住，拥上去打。宣传队高叫：“不要打，是我们的同学装扮的。”可见老百姓对汉奸何等痛恨。当时我是逃难者，身受其害，完全和群众的思想感情融在一起。我曾和高年级的同学，到过令人敬仰的廉州一中参观学习，看到校园一派抗日救亡的气氛，深受感动。他们出墙报，写标语，歌咏队练唱救亡歌曲。剧团排练《放下你的鞭子》，人人投入抗日救亡行列，高中学生还组织大刀队，自制木枪、木刀操练，我真想快点长大，参加大刀队杀敌。呵！原来社会上的群众抗日救亡的高潮，潮源就是廉州一中师生的带动。

1938年冬，日寇又在北海对面的涠洲岛登陆，用舰艇封锁北部湾，见船就烧，并修筑飞机场，滥炸沿海城镇和广西，合浦首当其冲，受到海空威胁。我家又从廉州镇逃难到钦州城居住，在这里也逃不了日寇的狂轰滥炸，经常发出防空警报，人民不得安宁。我在钦州中学继续读一年级，同级同学有沈鸿周、沈永欢，都是我们那良的沈家兄弟，大家相依为命。40年代又同他俩在防城中学高中毕业，是6年同窗校友。1945年又同沈鸿周一起组织那良抗日武装起义，是亲密战友；沈永欢高中毕业后，考上中山大